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 主编

陳

鈴

异邦的借镜

當我大長兄像姜文的評價，季進曾一果

著

一假人。去其情。操其術。以欺人。每以入於死。而死者。亦人。生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文津出版社

陈铨

异邦的借镜

季进 曾一果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天津出版社

选题策划：徐 迅 龙 杰

责任编辑：李君伟

责任印制：李文宗

封面设计：张守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铨 异邦的借镜 / 季进, 曾一果著.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乐黛云主编)

ISBN 7-80554-486-7

I. 陈… II. 季… III. 陈铨—作品—文学评论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012 号

·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陈铨 异邦的借镜

CHEN QUAN YIBANG DE JIEJING

乐黛云 主编 季 进 曾一果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 津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6.75 印张 175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80554-486-7

K·67 定价: 1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总 序

乐黛云

21 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 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国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

总
序



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功力，是继20世纪

初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羨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基本上做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本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总

序



目 录

第一章 思想的熔铸	(1)
一、从传统出发	(1)
二、水木清华	(6)
三、亲炙名师	(23)
四、求学异国	(33)
第二章 重构民族意识	(45)
一、1937年前后	(45)
二、时代之波	(57)
三、文学的力量	(77)
第三章 残酷的浪漫	(85)
一、《野玫瑰》风波	(85)
二、文学与政治	(92)
三、《蓝蝴蝶》与《金指环》	(101)
四、从“天问”到“狂飙”	(113)
第四章 异邦的借镜	(123)
一、中国之德国	(123)
二、“中国文学的世界性”	(130)
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143)
四、“伟大的将来”	(151)
尾声 后台休息	(159)
参考书目	(176)
陈铨大事年表	(185)
附录	
陈铨译《精神现象学》残稿	(195)
后记	(205)



第一章 思想的熔铸

一、从传统出发

现代和传统的冲突是近现代中国所遭遇的最重大的事件，引发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变革运动。研究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美国学者杰罗姆·B·格里德尔（Jerome B. Grieder）在他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中开宗明义地写下这样一段话：

变革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主题。变革不仅是变化，而且是一场巨大的、无法估量的历史转换，它冲垮了一切反对者的抵御，超出并越过了企图给它以限制和定向的道路，涤荡了面对的制度和个人。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人，凭本能就可以理解托克维尔对古代政体的悼亡之意：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濒临灭亡的传统的捍卫者，还是批判者，都比任何人更具有有一种毁灭性的精神困惑。^①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巨大问题是如何面对一个迥异于传统的世界。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乱时

^① 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代，是“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的轴心时代。而五四时代似乎重现了这种动荡和变乱。但是，恰如葛剑雄所言：“‘道术将为天下裂’，这并不是一个悲哀的结局而是一个辉煌的开端。”^① 统一的思想和知识分崩离析，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而新的传统尚未建立，这种分崩离析正为个人的自由思考提供了条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和个体经验为社会重构一幅想像的图式。五四时代各种思想和观念以及实践行为的出现，实际上显示了一个思想史上的繁荣时代。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同样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氛围之中，无论如何批判传统，传统也不会一下子就从他们身上消失，相反正是由于对传统知识体系、道德秩序以及政治制度的熟悉，才使得他们对传统的批判更加强劲有力。

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无论是宣扬传统，还是批判传统，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共同的特征，都属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的人物，挣扎在传统和现代更替的历史漩涡之中。“过渡时代”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完全皈依“国粹”，正如杰罗姆·B·格里德尔在分析王韬和何启时指出的那样：“‘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界限，不仅仅是一个人从上海到杭州徒步旅行时穿越的地区疆界。它也是一个思想、心灵和个人生活中的分界。”^② 要做到一个人完全在“思想”、“心灵”和“个人生活”上完全背离传统生活是相当困难的，同样，要一个人完全信赖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精神困惑

① 葛剑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69 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② 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149 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因此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表征。西方和东方、传统与现代的论争成了知识分子喋喋不休的中心话题，无论是接受传统也好，还是拒绝传统也好，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他们之前以及之后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们不得不同时受到双重的文化影响，也不得不在漫长的学习道路和比较接触中逐渐接受、认同某种价值观念。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大致相似的人生经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早年都是在私塾这样的传统学校中度过，然后才进入现代学校，有的人进而出洋留学。鲁迅的《朝花夕拾》记载了他对私塾教育的看法，似乎可以代表那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传统教育的认识。私塾的教育方法看似荒唐可笑，可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儿童们虽然不懂得“子曰诗云”的真正含义，却在无形中受到了传统的熏陶。

陈铨，光绪二十九年的农历八月初五（1903 年 9 月 25 日）出生于四川富顺县城的盐井街。巴蜀虽然地处内陆，交通很不发达，但自古以来却是天府之国，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相当的文化传统。相对于陕西、新疆和贵州等地而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四川的文化教育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所以近代以来巴蜀之地人才辈出，陈独秀、郭沫若、巴金、张大千、齐白石等等都来自四川。四川很多地方盛产盐，当代作家李锐的《银城故事》就是以清朝四川的盐都自贡为背景，描述了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地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陈铨的家乡富顺就属于自贡市，四川产盐最多的地方自流井也在它的境内。陈铨后来在他的长篇小说《天问》中曾以大段篇幅盛赞自己的家乡：

富顺在四川的南部，沱江的下游，管辖了一百多个乡场，四川产盐最多的地方自流井，也在它的境内，所以在四川总算几个大县之一了。不但地面宽，出产也很丰富，盐是不用说的，其他米、麦、糖、麻、炭、油、花生、白薯，所有吃的、烧的、用的，无一样不兼备，居民有钱的

甚多，所以四川有句话“金犍为，银富顺”，……富顺县城固然不能算很大的城市，然而城内决不能说萧条，一四七赶西门，二五八赶后街，三六九赶东街，除逢十的日子，每天都有场期，乡里的人，一个个都担起米、豆、麦、布各种的东西来卖。^①

陈铨名大铨，号选卿，他要比鲁迅小得多，但是也像鲁迅一样，童年时代依然沉浸在“子曰诗云”的知识传统中。他的父亲陈智府是光绪六年（1880年）的秀才，除了熟悉“四书五经”之外，还精通中医，并在家里开了个中药铺。陈铨的儿童时代是在私塾里度过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十三岁之前。那些“子曰诗云”的启蒙教育，与他所熟悉的富顺的大街小巷幻化在一起，成为陈铨对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在1963年1月22日的日记里，他还回忆起了儿时的事情：“前两日忽回忆起，幼年时追悼蔡松坡、黄克强，学生游行唱的歌词三首。歌词出自富顺县一位老先生，已忘其姓名，但我觉得文字很漂亮，距今已五十年，还忽然想起，可见当时印象之深。第一首：黄克强黄克强，革命好儿郎。……”^②陈铨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憎恶。鲁迅对儒教制度的反叛情绪在他的回忆散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课临摹绣像小说的插图，想办法逃到百草园中玩耍，而童年的陈铨不仅没有像鲁迅那样厌恶和逃避私塾学堂，反而十分用功。据说陈铨因为埋头读书过于专心而导致了假性失明，他的祖母送了一个专用的小书桌之后，他兴奋不已，视力竟然也得到了恢复。私塾的教育制度奠定了陈铨的古典修养，使得陈铨对传统的思想、知识和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陈铨像所有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在私塾教育中学会了写古诗，可他写的一些古诗并没有发

① 陈铨：《天问》，上海，新月书店，1928。

② 陈铨：《陈铨日记》残稿，未刊稿。

表，很多手稿和信笺已经散失。

如果说陈铨的小说和戏剧是陈铨积极投入现代社会的“公共话语”，那么陈铨的古诗创作则常常是沉浸在“私人话语”中，渗透着个人对亲人、故乡以及爱情的浓厚情感。无论是在清华读书，还是后来在美国读书，陈铨也像一个多愁善感的传统文人一样创作了不少旧诗词，可惜现在留存极少。我们也很难把那些多愁善感的旧诗词，跟后来这个具有高度民族主义情绪、宣扬“权力意志”的“战国策派”主将联系在一起。这或许间接地表明后来陈铨等人接受尼采的意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被迫现代化”的需要，是由于对中国前途危机的忧虑。当然，陈铨有些古诗和他的主要思想还是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表现出对国家危机的关注。譬如1928年陈铨在美国奥柏林大学的时候，曾经写一首诗歌送别一个名叫刘丽贤的女士。刘丽贤是陈铨在奥柏林的同学，广东籍，因为生病退学，去纽约她婶婶那里养病，陈铨为送她写下了《丽贤东行感别》，强烈表达了对处于战乱中的祖国的关切：

昨闻啼鴂声，心绪正怛怛。今日复何日，挥手送君行。
同是居异乡，同是远游人。翘首望故国，故国正刀兵。奈何
君复病，别我作东征？春风池水绿，新月柳枝横。感此忧我
心，无以遣中情。援君加珍重，莫听杜鹃鸣。

仅仅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首诗歌显然并不优秀，但它通过送别故人，表达出了杜甫式的忧国情绪。通过早年的古典知识学习，陈铨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了较为深切的体认。他日后从事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显示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宏阔视野，这显然与早年的积累与修养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当然，陈铨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仅仅来自于童年时代严格的古典知识训练，他和鲁迅、胡适等人一样，同时也是在现代文化

的知识背景和思想结构中重新认识传统，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思想潮流的牵引下，他们每个人对于传统的认识都会有很大差异。

青少年时代的陈铨一直生活在优裕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在战乱不断的中国社会里，能够有这样舒适的生活环境相当不容易。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也使得陈铨从小就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我们从陈铨早期的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出这点。照片上的少年陈铨坐在一张椅子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身上的衣服整洁干净，他的脸微胖，目光自信，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

十三岁以后，陈铨便将被父亲送到了富顺县的高等小学堂读书。他聪慧过人，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小学课程。1919年，陈铨考入了四川省国立成都中学，和以后著名的革命作家阳翰笙是同班同学，两个人的成绩都特别优秀，表现十分突出，不过阳翰笙因为参加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而被四川省国立成都中学开除，而陈铨则考上了北平的清华学校。从此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可彼此之间一直保留着深厚的友谊。

二、水木清华

1921年，陈铨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这一年清华学校总共只录取了很少的几名四川籍学生，可见陈铨的确天资聪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那时虽然只是个预备学校，但在当时的中国差不多等于是高等学府了，进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实际上也就开始接受现代大学教育。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这段经历对于陈铨来说至关重要，正是在这所著名的学校里，陈铨接触到了现代的西方思想，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杰出人物，同时由于清华学校的国学氛围浓厚，在吴宓、王国维等人的影响下，陈铨对中国的儒学传统有了更多的领悟。清华预备学校时期，陈铨的重要思想观念初步奠定。



并非每所大学都能培养出杰出的知识分子，现代大学自身的文化机制非常重要，相比较而言，文化中心和著名学府更容易培养出优秀人才。文化中心和著名学府往往具有更古老优良的大学传统，诸如悠久的人文历史、出国机会、科研条件以及学术氛围等等，许多方面的条件都是通常学校在短时间难以与之媲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文化中心和著名学府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圈层”，相对而言，进入这种“文化圈层”（著名学府）的知识分子个体的成功几率要比进入普通学校的知识分子高得多。著名学府文化场中集中了大量知识精英，他们掌握着各类知识、学术和思想资本，进入这样的“文化圈层”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如果进不了中心的“文化圈层”，即使再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也有可能被遗忘或冷落，他所掌握的高深的知识和学问很可能得不到认可，或者被埋没以至被人剽窃。像王国维、梁漱溟这样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也必须借助著名学府来宣扬他们的文化思想。据说康有为许多惊世骇俗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一个四川学者廖平的著作，康有为以某种方式阅读到了廖平的著作，而廖平长期过着远离学术和政治争论中心地带的隐居生活，鲜为人知。在精英云集的北大和清华知识分子阶层中脱颖而出既可以说难，但也可以说相对很容易，这种“文化资本”是偏远地区的学校所无法具备的。因此，著名高校和文化的中心领域，总是全国各地学子们竞争的场所。1917年胡适回国之前，就十分清楚地表示要找个最高的大学作为栖身之所，而那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向胡适发出了邀请，这正是胡适求之不得的机遇。1917年5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仅一周，就向导师杜威（John Dewey）辞行，结束了在美国的七年生活，回到了国立北京大学，从此在中国知识界发挥出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召唤力。

陈铨能够进入清华学校的大门，自然也是一个幸运者。

清华学校最早的名称是“游美肄业馆”，其创立当归功于清

政府的驻美国公使梁诚。他在美国国务院翻阅秘密档案，又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读到了有关“庚子赔款”的历史材料，发现1901年美国借义和团“闹事”向晚清政府索要的赔款有很多地方不符合道德伦理和实际情况，于是梁诚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向美国政府据理力争，要求退还部分赔款。梁诚的建议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批准。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退回中国1901年八国联军赔款余额的方案：可退回多余款项，但该款必须用来资助留美的中国学生，以达到他们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领袖的目的。历史的发展往往带有戏剧性，梁诚的行为几乎为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1909年6月，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同年8月清华园被清政府作为“游美肄业馆”馆址，招收了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1909年第一批四十七名学生被送到了美国留学。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全部迁入清华园，清华园被改名为清华学堂，并于1911年4月29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天也就成为了清华的校庆日（“国立清华大学”之名1928年才正式确立）。清华学校的学制为八年，直接从各地小学毕业生中招考，分四年中等科和四年高等科两个阶段学习，毕业后送往美国官费留学。胡适、梅贻琦、梅光迪和赵元任都是较早一批考上清华预科班并留学美国的，这些人归国之后都纷纷成了中国学术、政治和科学领域中的重要人物。陈铨的老师吴宓也出身于“留美预科班”，当时吴宓已经十七岁，比规定年龄超过了两岁，吴宓涂改了年龄才得以进入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并留学美国，后来又重返清华，成为清华研究院的创办人之一。^①

陈铨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正逢清华学校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这所新旧结合的学堂可谓人才济济，既有西装革履的新潮人物，也有穿着长衫的旧派人物，充满了中西文化不断碰撞裂变的

^①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9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



混合现象。学校的工科很发达，可它的文科尤其是国学传统也非常发达，完全可以和北京大学相媲美。这主要得力于校长曹云祥的努力，曹云祥似乎要有意效仿蔡元培，把清华学校打造成一个思想独立、学术自由、文理兼并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一方面依然大力发展理工科，另一方面在文科也投入了不少力量。1925年，曹云祥聘请美国“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中国门徒、《学衡》主编吴宓主持清华学校的研究院工作。吴宓上任后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使得清华学校一下子成为国学研究中心。而在新文学方面，随着朱自清、杨振声等人的加入，清华大学的新文学也很有特色。所以现在有学者认为，我们在肯定北京大学为中国学术和思想所做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清华大学同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①

生活这样的学校自然对个体的成长非常有利。陈铨在清华学校里颇为活跃，大学里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为他提供了发挥才华的机会。他参加了好几个文学和政治社团，比如赵访熊等人组成的“群声学会”，北大清华部分同学组成的“青年励志会”等。1924年夏天，他还和同乡好友杨允奎等人跑到青岛海边度暑假，游泳、打球、散步、读书、聊天，还登泰山看日出。那个时候的陈铨，正处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的好年纪，那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让青年陈铨心潮澎湃：

再睡一会，晨星只有三五，金星的光芒，也减淡了好些。东方发出一片赤金颜色的云来，移时金色变而为鲜红色，天色发白，邻近山峰，已可看见，再隔一阵，愈看愈远，山上的白云，被风一吹，都往东飞去，从山峰飞到山下，如

^① 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11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游龙，如柳絮，变幻不测。近日出的云，都变成红绿青紫各种颜色出来。小说上说一位神仙出来，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此时真有那一种样子。但是云头虽然好看，却把太阳遮住了，云一片片的从日边飞过，忽然云渐渐散开，我们看出一半的红日来，渐次渐次上升上升，一下整个的日头都出来了，金光四射，如一大玛瑙，发出万丈光芒来。浮云渐渐散开，山峰历历可见，泰安府黄河，都一一呈露，傲来峰嶙峋峙立，好像一位矍铄古怪的老人，在挺身独立，英风飒爽，无限自豪的样子。^①

1925年，陈铨由同学介绍加入了王造时负责的“仁社”，仁社的成员包括贺麟、张荫麟以及林同济等人。社长是江西人王造时，即后来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和陈铨是终身挚友。贺麟也是陈铨的好朋友，和陈铨一样，从清华毕业后，先是留学美国，但是美国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贺麟对黑格尔（G. W. F. Hegel）的兴趣，于是又转到德国继续学习哲学，后来成为国内研究黑格尔的权威。贺麟后来还从事儒学的复兴活动，大力倡导新儒学，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25年，贺麟担任《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张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而陈铨主持的是文艺副刊。贺麟说，“他们特别热心，……‘四海寻畏友，所得惟两人。一是东莞张，一是富顺陈。……陈心好似大明镜，万事万理无遁形。……陈言利似刃，斩金截铁解纠纷，判析毫芒惊鬼神。……自得两君后，神志渐清明。……勇气觉倍增。好友相扶持，欲罢也不能。’”^②正是因为这种友谊，贺麟后来也参与到了“战国策派”当中，与陈铨保持着终身的友谊。20世纪20年代是个风云跌宕的时代，学生运动频繁，陈铨免不了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学生运

① 陈铨：《海滨日记》（1924年8月28日），未刊稿。

② 贺麟：《我所认识的张荫麟》，载《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